



斯大林——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

奧斯特羅維強諾夫著 劉執之譯

海燕書店出版



斯大林——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

奧斯特羅維強諾夫著

劉 勤 少 譯

海 益 書 店

· 1951 ·



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

К. В.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Сталин — Создате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本書係根據蘇聯科學院編獻給斯大林文集(一九四九年版)譯出

列寧和斯大林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功績之一，是他們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學說和方法爲指南，以革命鬪爭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新的實踐的概括爲基礎，建立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

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組成部份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把支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關係的規律，在它們的發生、發展和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更高階段中來加以研究。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給我們卓越地描述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經濟，描述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指出過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更高的共產主義階段的道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爲革命運動所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一個國家單獨取得政權勝利的可能性問題，而當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以後，則是關於在一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性、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

性問題。

列寧最偉大的創造性的功績，即在於他從新審查了對於帝國主義時代已經過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同時勝利的命題，而用關於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新命題代替了它。

斯大林同志還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前夜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就說過：『很有可能恰好俄國是開拓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一八六頁）

列寧與斯大林用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個國家勝利的理論武裝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

者之後，創立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計劃。列寧在其關於新經濟政策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合作化計劃的著作中會把這個計劃的原理定式化過。

在恢復時期終了時，關於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作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問題特別尖銳地發生了。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托洛斯基份子說在我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

斯大林同志給了托洛斯基主義以迎頭痛擊，而把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能够建成的學說，適用於新的情況，加以論證和發展，因而以明顯的前途武裝了社會主義建設者，使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的勝利，具有深刻的信心。

更進一步研究社會主義在我國建成的理論和把這個理論實現的任務，落到了斯大林——列寧的最密切的朋友和戰友，他的事業的偉大的繼承者——的肩上。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的關於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的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命題。他在聯合（布）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說，「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的特殊政策，

這種政策就是在最高控制權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使社會主義成份跟資本主義成份鬪爭，……使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消滅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三六四頁）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觀念時，創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的理論。

斯大林曾排斥那種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不能容受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掠奪殖民地、賦課、綁結奴役的租借地和開發地。斯大林同志的國家工業化政策，是根據深刻理解和有意識地利用蘇維埃經濟的規律性和優越性，根據社會主義積累的內在源泉的利用製訂出來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在自發地追求利潤之中實現的，並且是從輕工業開始的。斯大林製訂出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跟資本主義的方法根本不同。它的要點就在於蘇維埃國家，依靠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國家工業化事業。由於這個緣故，我們的國家在極短的歷史時期（約十三年）從落後的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國家，從農業國家變成了強大的工業國家，用最先

進的技術武裝起來的國家。歷史上還不知道有這樣快的發展速度。

資本主義工業化是以剝削工人和農民，是以工農大眾的貧困化和奴隸化爲基礎的，與此相反，伴隨社會主義工業化而來的是勞動者物質和文化水準的增長，這種增長是工業的國內市場的擴張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斯大林發展列寧的農業經濟社會主義建設的合作化計劃時，創立了發展的理論，並製訂出了農業經濟合作化的具體綱領，它在斯大林的直接領導下面已經在蘇聯實現了。

這個綱領包含着蘇維埃政府吸引貧農和中農大眾加入種種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這些經過深刻考慮的辦法；在這個綱領裏預先考慮到對生產合作社各種形式的鼓勵、預購方法、價格政策、稅務政策的利用。綱領曾提到經由機器拖拉機站用拖拉機和割打複合機來幫助集體農場，對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在組織方面和農業技術方面的幫助。在這個綱領中，澈底採用了限制和排除富農階級，以社會主義精

神重新教育農民的路線。這些方法是創造農民大批地進入集體化和在這個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道路。

農業集體化就是表示依其結果來說是跟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變革有同等意義的深刻的革命變革。

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它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在政治的上層建築中的相應變化的法律保證建立了根基。

這個任務已被斯大林新憲法的採用所解決了。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在跟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賣國的外國間諜——竭力想把我國拉回到資本主義道路，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地的托洛斯基派和布哈林派進行不可調和的鬭爭中達到的。

跟列寧斯大林的計劃相適合的、在斯大林天才領導之下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經濟

體系，證明了它的偉大的生活力，它的不論在和平建設年代和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極大優越。在困難的戰爭年代再一次極清楚地顯露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

列寧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建成的理論和經驗具有全世界歷史性的意義。它們對於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各人民民主國家，是什麼都不能替換的指南，它們鼓舞了資本主義各國被壓迫人民反對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鬥爭。

斯大林根據共產主義原則領導實施蘇聯的經濟改造和一切社會關係的改造的偉大計劃時，他是憑藉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它的動力和它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大優越性的深刻知識的。

研究過渡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性，要求特殊的方法，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和發展方法不同的方法。兩種方法的不同首先是由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性產

生出來的。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性的思想時，曾指出它跟資產階級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這個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卻是要在奪取政權以後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二十一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用強制方法來剝奪剝奪者，把基本的生產手段抓在自己手中，憑藉基本的生產手段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來領導社會主義的建設。

生產手段為社會主義的公共所有，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基礎。

在十月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樹立之後，根本地改變了社會今後發展的方向和性質。

調節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自發的機械作用，在蘇聯已為國家自覺地有計劃地領導的經濟發展所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在新社會的建設中起着決定的作用。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系中基本的領導力量是共產黨。「黨的使命就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羣衆組織的工作，並把它們的行動指向於一個目標，指向於解放無產階級的目標。」（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三四頁）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關於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的學說時寫道：「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實現的。無產階級對農民所實行的國家領導，就是經過蘇維埃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三十三頁）其次，斯大林所舉的羣衆跟無產階級先鋒隊相連結的，還有職工會，各種合作社，和青年團。

斯大林在發展列寧關於經濟和政治的指示時曾經指出，政治是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列寧斯大林黨的政治是組織經濟和改造經濟，使它向着共產主義道路發展的強有力的力量。關於經濟和具有全國意義的任何重要決定，應當首先從政治的觀

點來評估。

依照列寧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用政治的態度去處理經濟，就是意味國家由社會主義經濟要求的觀點，由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任務的觀點來作遠大的處理，這種處理態度是跟狹隘經濟的、本位主義的、地方主義的、系統主義的處理態度相反的。

斯大林教導說：『實際上政治與經濟是不能分開的。它們一同存在和一同作用着。誰想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把經濟跟政治分開，以減低政治工作的價值來加強經濟工作，或者反之，以減低經濟工作的價值來加強政治工作，則誰就要走入絕路。』（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斯基及其他兩面派的方法）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思想都放進了馬列主義的黃金寶庫裏面，構成了黨和國家領導國民經濟的實踐的基礎，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所達到的光輝成就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在把列寧的學說提高到新的階段時，創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在經

濟發展中的特殊任務的發展的理論。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在特殊意義上說來，經濟並不在國家手中。恰恰相反；國家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手中，即在資本主義的獨佔和財政資本大亨集團的手中，他們把國家政權的機器變成在國內壓迫勞動者的武器和在世界舞台上帝國主義侵略的武器。

資產階級國家並不能有計劃地領導經濟。這是由於生產手段是屬於資本家和獨佔資本私人所有。

跟資產階級國家相反，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的蘇維埃國家，表現了全蘇聯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利益。蘇維埃政府憑藉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公共所有，澈底地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並且有計劃地領導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斯大林同志指出，蘇維埃國家經過了它的發展的兩個主要階段——剝削階級消滅以前的階段和它們消滅以後的階段。

如果在第一階段，國家的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的機能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那

麼在第二階段上和平的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的機能就提到了第一位。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組織機能在其發展的第一階段上就已經根本跟資產階級國家在經濟領域內的機能有着原則的區別。

資產階級國家只是經過立法體系和其他如調整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和保障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等辦法來間接作用於經濟的發展。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最初年代在我國所實行的土地和工廠的國有化，帶來了在國家直接管理中的國有的社會主義成份的發生。蘇維埃政府憑藉這一部門，對過渡期的經濟發展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把它導向社會主義，保證了對於資本主義因素的限制和消滅，以及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但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組織機能最充分的發展是在第二階段，在剝削階級消滅以後。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組織機能包容了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

蘇維埃國家對全部國民經濟：工業、運輸、農業、商業信貸、貨幣流通等等實

行了有計劃的領導：它直接管理國家企業，有計劃地經過地方蘇維埃、經過機器拖拉機站、經過農業合作社的代表機關來領導集體農場生產的發展，用全力幫助集體農場的組織和經濟的鞏固。

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特殊性，就在於它們並不是自流地實現的，好像一種自發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作為認識的必然性發揮出自己的作用來的。這就是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經濟的動力和優越性是經過黨的政策和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與組織的機能來變成現實性的。

在發展列寧的學說時，斯大林創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的發展的理論。他指出社會主義計劃，在生產手段社會公有的條件下是一種客觀的必然性，在我國，生產的發展並不遵從競爭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遵從有計劃的領導原則。

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實施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時，追求三個基本任務：（一）保障蘇聯經濟的獨立性，使它不依賴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二）承認社會主義經